



杨栗山

杨栗山，清代著名医家，其治温十五方，颇受后人推崇。已故现代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曾指出，“瘟疫实与四时温病不同，是杂气为病，杨栗山十五方，治疗杂气瘟疫，疗效很好。”

系列之传世名方

大国医

总主编·钟相根
畅洪昇
主编·赵岩松

传世名方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大国医系列之传世名方

杨栗山传世名方

总主编◎钟相根 畅洪昇

主 编◎赵岩松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杨栗山，历史上著名的温病大家。本书全面收录了杨栗山自创医方，并对古今医家应用杨栗山方剂的医案及临床报道进行筛选，撷英取华，汇编而成。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能够帮助读者开阔视野，增进学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栗山传世名方/赵岩松主编.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 2

(大国医系列·传世名方)

ISBN 978 - 7 - 5067 - 5867 - 3

I. ①杨… II. ①赵… III. ①方书 - 汇编 - 中国 - 清代 IV. ①R289.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1165 号

美术编辑 陈君杞

版式设计 郭小平

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编 100082

电话 发行: 010 - 62227427 邮购: 010 - 62236938

网址 www.cmstp.com

规格 710 × 1020mm 1/16

印张 6 1/2

字数 9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书号 ISBN 978 - 7 - 5067 - 5867 - 3

定价 1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 钟相根 畅洪昇

副总主编 刘 敏 张冬梅 赵岩松 段晓华
盛庆寿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越	王 玮	王伟明	王雪茜
王 璞	石 玥	令狐永谊	司鹏飞
朱丽颖	农 慧	刘 果	闫军堂
苏毅强	李 明	肖双双	何善明
张水馨	郑子安	赵 艳	高 峰
黄 中	梁吉春		

编委会

主 编 赵岩松

副主编 高 峰 刘 果 王 玮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河 王 昀 孙凌云

刘蕊洁 巫璧盈 林 彬

姜思竹

前 言

中医名著浩如烟海，积淀了数以千年的精华，养育了难以计数的英才，昭示着绚丽无比的辉煌。历史证明，中医的成才之路，非经典名著滋养下的躬身实践，别无蹊径。名医撰医著，医著载医方，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历代名医凭借非凡的智慧及丰富的临床实践，创制了诸多不朽的传世名方。

本套丛书以在方剂学方面确有创见的历代名医为主线，选择代表性名医，将其所撰医著中的医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每个分册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简单介绍医家学术思想及遣药组方特色；中篇详细介绍了该医家方剂在临床各科的应用；另外，该医家还有许多名方不为世人所熟知，未见临床报道，则收入下篇被忽略的名方。每首方剂从来源、组成、用法、功用、主治、方解、方论、临床应用、临证提要等方面来论述。全书收罗广博、条分缕析，详略适中，既言于古；更验于今，既利掌握，又裨读者更好地熟悉、掌握历代名方的组方原理及临床运用规律，以适应当前临床实际的需要。

愿《大国医系列之传世名方》成为中医药院校在校学生和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的良师益友；愿本套丛书成为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及各图书馆的永久珍藏。

编 者

2012年12月

目 录

上篇 温病大家杨栗山

一、医家生平·····	2	四、辨治特点·····	14
二、成书背景及影响·····	3	五、用药特色与组方规律·····	20
三、学术主张·····	7		

下篇 屡试屡效方

升降散·····	30	生地黄连汤·····	75
增损大柴胡汤·····	44	解毒承气汤·····	76
增损双解散·····	46	地榆散·····	78
加味凉膈散·····	50	芳香饮·····	81
增损三黄石膏汤·····	55	参归养荣汤·····	83
神解散·····	57	大清凉散·····	85
清化汤·····	61	加味六一顺气汤·····	87
小清凉散·····	63	小复苏饮·····	89
增损普济消毒饮·····	65	疏表汤·····	90
人参固本汤·····	69	三和汤·····	91
黄芪汤·····	70	大复苏饮·····	93
枳实理中丸·····	72		

上篇
温病大家杨栗山



一、医家生平

杨璇，一名杨浚，名璿，字玉衡，号栗山。杨栗山生于“诗礼名族”，书香世家。上溯其父讳宓，文学；祖讳廷陈、曾讳楫，文学；高讳清，文学；太高讳思谦，文学；至始祖讳仲友，原籍亳州，明永乐初年迁夏，读书力田，广业四百倾，遂家焉。十三世文库奕叶相继，诗礼名族，忠孝传家。“生平所为，光明正大”。从小聪敏好学，幼读宋儒名臣言行录，便立志以韩魏公韩琦、司马光等名臣自期待。雍正戊申年（1728年），杨氏24岁科举考试成为秀才，当时录取他的老师于公广批其卷云：“三试经义论策，沉潜理窟如话家常，有关世教，有裨治道，有且于民生，日用粹然，儒者之言，此国土之风也，他日必非常人。”但杨氏屡试不第，信其命如此，不可相强，故而转治于医。“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乡闾已经七困，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熟复《灵》、《素》，更详热论”，专治岐黄之术。可见其于年近四十之时方才正式研究医学。

关于杨栗山的生卒年代，诸说不一。有云“公元1705~？”，如徐国仟点校《伤寒瘟疫条辨》；有云“公元1706~1795”，如李经纬《中医人物辞典》；有的则笼统说“约生于公元十八世纪”，如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据《寒温条辨》自序刻书时为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岁次甲辰，时年七十有九，生年可上推七十九年（公元1705年）。根据民国九年《夏邑县志》云“寿九十无子”，卒年可下延约至1795年，享年90岁，相当于乾隆六十年去世。《夏邑县志》称其无子，但孙宏智序称其从杨璇之子的手中得到《伤寒瘟疫条辨》一书。其谓：“透明府杨公自溧水来，出其尊甫栗山先生所著《寒温条辨》。”“尊甫”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卢文弨序称“静川孙公得其书于令嗣楼川明府”，据此则杨氏当有后嗣。

杨栗山为河南夏邑县人。据《伤寒瘟疫条辨》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刊本中，进士、礼部右侍郎庄存与给本书作的序中写道“先生姓杨氏名璇，字玉衡，栗山其号也……世居中州之夏邑。”袁枚《序》称：“中州

杨玉衡先生，以经世之才，旁治歧黄之术。”两序中之“中州”，无疑是“河南省”。另有民国九年《夏邑县志·人物·儒修》载有杨璇之传记；民国三十一年《河南通志·艺文志·子部·医家类》曰：“杨璇，字玉衡，夏邑县人……。”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杨璇祖籍江苏溧水或四川成都，显然是不正确的。至于《伤寒瘟疫条辨》自序最后有“书于溧水县署”的文字，应是说明该序是杨璇在溧水县写的，而不能代表杨璇是溧水县人。

杨氏所处的时代，传染病广泛流行，他一生曾经历了多次的瘟疫流传。乾隆乙亥、丙子、丁丑，夏邑连歉，瘟疫盛行，死者枕藉，杨氏用升降散，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得愈者十数人，余无算。随将此方传施亲友，贴示集市，全活甚众。杨氏有鉴于“世之凶恶大病，死生人在反掌间者，尽属温病，而发于冬月之正伤寒，百不一二，仲景著书独详于彼而略于此”。深痛世人“于病寒病温两者之辨不明，故处方多误，以致杀人”，“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无人不以伤寒方治温病，混淆不清，贻害无穷”。“虽河间、安道已悉证治不同而未能穷其源。”杨氏面对“瘟疫盛行，死者枕藉”的残酷现实，对伤寒和温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不惟救耳目所接之人，而且欲救天下之人”，晚年寓居江苏溧水县，正值当地瘟疫流行，以其方法疗之者，每获良效，于是“集群言之粹，择千失之得，零星采辑，参以管见，在七十九岁高龄，著成《伤寒瘟疫条辨》，“务辨出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不复掺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并表明：“吾人立法立言，特患不合于理，无济于世耳。果能有合于理，有济于世，虽违之，庸何伤。”真实地抒发了杨栗山高尚的品德和胸怀。

二、成书背景及影响

《伤寒瘟疫条辨》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书成计两百余年，历各省刊印，代有巨儒评序，裨世非浅，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载，全国现有36种刻本和抄本。全书共六卷，卷一为总论，论伤寒与瘟疫之别，载医论二十余篇，从伤寒、瘟疫的病因、脉法、证候、治法等方面，一一详辨；卷二、卷三为辨证，对伤寒、瘟疫出现的七十余种证候进行辨证；卷四、卷五为医方辨，选方二百余首，多为前人成方，而治温十五方，乃师

古化裁之方，颇受后人推崇；卷六为本草辨，对治寒温有关的一百九十种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及主治等加以归纳、阐述；后附成方或是验案，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药物之功能效用。

杨氏学术思想，主要受到吴又可《温疫论》的启发，上溯《内经》、《难经》、《伤寒论》，旁及诸家，继承发展了其杂气学说，《伤寒瘟疫条辨》论理九十二则，旨在于“务辨出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灿然昌明于世，不复掺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提出“寒热为治病之达纲领”，书中阐明了伤寒瘟疫证治之异，并认为瘟疫与四时温病有别，瘟疫是杂气为病，致病力强，病情危重，并且传染性猛烈。

温病学说起源于《内经》，在金元时期开始昌兴，刘河间始则极力反对以辛温治疗伤寒，著有《伤寒直格》云：“以伤寒为杂病，以温病为大病，特制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为治温病主方。”为外感热病之治疗另辟了蹊径。元末明初王安道著《医经溯洄集》中有“《伤寒立法考》，温病热病，说其治法，较若眉列。”提出伤寒“治以辛温解表”，温病和热病“治以辛凉苦寒”，于是在治疗原则上，温病和伤寒才区别开来。二公虽识伤寒与温病异治，但未洞悉温病得天地之杂气，仍从外感风寒化热同治，实千虑一失之弊。

杨氏崇尚刘河间，认为刘河间是第一个“能辨温病与伤寒之异治者”，但又觉得他“对病源之所异者，亦未能道出汁浆”。杨氏畅发己意，力驳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夏而发的“伏寒化温”说，指出“由斯以谈，温病与伤寒同一根源也，又何怪乎后人治温病皆以伤寒方论治之也，殊不知温病另为一种，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并进一步分析严寒中人，均立即为病，没有藏伏人体之理，指出“严寒中人，顷刻即变，轻者感冒，重则伤寒，非若春夏秋风暑湿燥所伤之可缓也”。感冒之轻症，尚有头痛身痛、发热畏寒、鼻塞流涕等症，当即发病，不能容忍。严寒杀厉所中，又何能藏伏过时而变呢？再则，风寒侵入，未有不由肌表而入，肌表乃“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偶尔脱衣换帽，所冒些小风寒，当时而嚏，尚不能稽留，何况严寒杀厉之气，且藏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忍至春，更历春至夏发耶”，不待辨而知误矣。杨氏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温病从伤寒中脱离来自成体系的进程之中，虽然难免受到“伏气温病”理论的影响，认识不到表邪在温病中的存在，但

杨氏能创造性地将“两感”学说引入温病学，并在刘河间表里双解思想的基础上创立有效的治温方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明·吴又可著《温疫论》认为，瘟疫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即邪自口鼻而入，侵及膜原，而即发病。杨氏十分推崇吴又可“温病得天地之杂气”之说，反复强调“杂气”之客体“无形无声”，“毒雾之来也无端，烟瘴之出也无时，湿热熏蒸之恶秽无穷无数，兼以饿殍在野，骸骨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连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加之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故其伤人则症状繁杂，是“知其气各异也，故谓之杂气。”他说：“大约病遍于一方，沿门阖户，众人皆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这是杨氏在吴又可瘟疫是“非时之气”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满了疠气学说。杨氏认为温病“四时皆有，春夏较多，常年不断”，而瘟疫则是“偏于一方，沿门阖户”，发展了吴氏的瘟疫学说，明确区分瘟疫与狭义温病。这种病因学上的认识为新感温病理论的发展铺垫了路径，在理论上扫清了思想障碍，在温病学说的发展史上算是可圈可点的一笔。

同时，杨氏对王叔和时气致疫的论点力持异议。叔和承《内经》之说，认为伤寒是“以病因命名”，温病、热病是以“天时与病形命名”，认为春大寒，夏大凉，秋大热，冬大温，乃“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杨氏认为：“时行之气，宜热而冷，宜冷而热，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岂能外乎四时之本气。”是以风温、暑温、湿温、秋温诸四时不节之时气病，所感终不离本源，即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与温病根源不同，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杂气致疫的观点，使吴又可的杂气学说的内涵更加明确，轮廓更加清晰。

关于杂气从口鼻而入，首先侵犯人体的部位，吴又可提出了著名的膜原说，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害，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所谓膜原是也。”对此，杨氏补充了瘟疫初起的临床见证，他从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瘟疫毒邪，即杂气侵伤人体，“一发则炎热炽盛，表里枯涸，内外大热”，“一热即口燥咽干而渴，脉多洪滑，甚则沉伏”，呈现一派中焦热盛的证候，

与膜原证之寒战热炽，呕恶身重，舌苔白厚而腻的表现不同。对温病的病机，杨氏吸取融通王安道、吴又可、张石顽等诸家之说，强调郁热自内达外，可由血分发出气分，与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有别。因此提出了“温热之邪，直行中道，初起阳明者十之八九”的中焦说。尝谓：“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不仅指出温病的感染途径及特点，还提出三焦定位的观点。所谓杨氏解释三焦定位说：“人之鼻气通于天，如毒雾烟瘴，谓之清邪，是杂气之浮而上者，从鼻息而上入于阳，而阳分受伤”，出现发热、头肿、项强痉挛等上焦证；“人之口气通于地，如水土物产，化为浊邪，是杂气之沉而下者，从口舌而下入于阴，而阴分受伤”，出现脐痛、泻、肠鸣等下焦证；“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则清浊相干，气滞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此三焦定位之邪也。”疫邪在人体内依其上中下三焦的道路“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引起种种变证。但无论何种杂气，中焦为必犯之地，是病变之重心。这些观点，较之吴又可“邪在膜原”、“九传之变”等瘟疫学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都认为，温病是由温、暑、燥、湿等不同邪气自口鼻侵入人体所引起，首先犯肺而发病，叶氏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而后吴氏创立了三焦辨证。在治疗上认为伤寒宜辛温解表，而温病则最忌辛温而用辛凉。杨栗山与叶天士同代，于1784年著《伤寒瘟疫条辨》，后于叶氏，而未沿袭叶氏卫气营血分证认识，乃借鉴上述三家之说，提出温病病因。他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有一种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也。故常气受病在表浅而易，杂气受病在里深而难。”他受吴又可“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的启示，并遵河间双解、凉膈制方之法，创制了升降散、芳香饮、清化汤及大、小清凉散等方，杨氏对瘟疫的治疗自云：“余推广河间双解、三黄之意”，但又有发挥与创见，体现其从三焦荡涤疫毒的主旨，在论治温病上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为治疗温病的简捷途径，其所创方剂在当今疑难杂病的治疗中仍发挥不可小觑的疗效。

杨栗山从对瘟疫病因病机的深邃见解，到清热解毒法的具体应用，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张之文氏认为：“杨氏治法，兼又可、余霖之

长。”这种评价，堪称允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杨栗山从不同方面辑录了刘河间《伤寒直格》、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吴又可《温疫论》、喻昌《尚论篇》、张璐《伤寒缙论》、陈尧道《伤寒辨证》、陈良佐《二分晰义》等书的部分内容，因此，有些论说似有因袭杂凑之感，又为《条辨》之不足。

《伤寒瘟疫条辨》成书于乾隆戊子年，即1768年，此书的首刊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即成书后16年才得以刊印，此书的广为流传应归功于孙宏智，孙氏官于江南，其第三儿适患温病，请数十位医生诊治，但无人知是何病，后得杨氏之书，知是温病，但其子之病已不可救，孙氏痛心疾首，后其家人患病，孙氏据书捡方，悉得痊愈。孙公后曾“悬贴通衢”，一时求医者甚众，经其治愈者十不失一，益信服杨氏之书。遂出资刊印此书，以广其传。孙氏还请当时的经学大家卢文弨、文坛才子袁枚等人作序，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知名度，为此书的流传做出了贡献。

此书刊行后深为后人推崇，如周魁的《温证指归》在评价《伤寒瘟疫条辨》时说：“其治瘟疫病一法，可谓集诸说之大成，而包罗万有，总汇众流者也。”世人盛赞其论“发千古未发之密”，“分析寒温，如快刀破竹，永断葛藤；如明镜取形，不隐毫发。”并运用杨氏的理法方药治疗温病，屡获卓效。清嘉庆辛未年间，吕田将是书之精要编入《瘟疫条辨摘要》，使其传播更为广泛。已故现代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曾指出，“瘟疫实与四时温病不同，是杂气为病，杨栗山十五方，治疗杂气瘟疫，疗效很好。”当代名医蒲辅周对杨栗山代表著作《伤寒瘟疫条辨》评价之高，并不亚于吴鞠通《温病条辨》，值得后世学者研读。

三、学术主张

（一）开篇首论运气

杨氏在《伤寒瘟疫条辨》卷一中，首先提出治病须知运气。《治病须知大运辨》说：“天以阴阳而运六气，须知有大运，有小运，小则逐岁而更，大则六十年而易。”还提出：“有于大运则合，岁气俱违者，自从其大而略变其间也，此常理也。有于小则合，于大相违，更有于大运岁气俱违者，偶尔之变，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可以看出杨氏对运气理论有很深的研

究，他十分重视气运变化对气候的影响，认为它能够进而影响到人体而发生疾病。还指出在治疗瘟疫类疾病时应根据该年的气运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

杨氏列举前人之治符合大运者为证，同篇说：“尝稽东垣李氏，一则补中为主；丹溪朱氏，一以滋阴为重；金人张氏，一以涤荡为先。皆能表表于世，总得挈领提纲，故合一本万殊之妙。否则当年岂无岁气，而必各取其一邪？再以痘疹言之，有扼要于保元，有独取于辛温，有得意于清凉，是亦治痘之名手，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别？要之，大运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如曰偏僻，则当年各操其一以应世，何以得各擅其长乎。又举自己体验说：“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毒火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以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向温补宜重者变而从轻，清泻宜轻者变而从重。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泻者，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验矣，势必荡涤而元泉之势始杀。至甲申、乙酉，荡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历年以来，居然成一定局，间有温补者，什一千百而已，是大运转于相火矣。”杨氏的“大运”是与“主运”相对比而言，大运的变化周期是60年，主运却是逐岁而更。因为大运、小运变化周期不同，所以就会有大运、小运不相合的情况发生。杨氏特别强调当大运、小运不相合时不可拘束于小运，即其所谓“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但杨氏也注意到疾病亦有与小运相合、大运相违，甚至与大运岁气俱违的情况发生。此时，杨氏强调以临床见证为要，而不以常局相推，体现出杨氏灵活的诊治经验和运用原则。

对于大运之说，清·陆九芝亦曾列举历史实例，以为六十年一转为之佐证，方今百花齐放之时，余亦不作左右袒，实际如何，诸君可自验于将来。

（二）条分缕析辨寒温

1. 辨病因 《伤寒瘟疫条辨》指出温病与伤寒的病因为：“伤寒得天地之常气，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自皮肤传经络，受病于气分，故感而即动。认真脉证治法，急以发表为第一义……”，“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即脉闭体厥，从无阴证，皆火毒

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进而分析说：“常气者，风寒暑湿燥火，天地四时错行之六气也；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燥非火，乃天地间另一种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多起于兵荒之岁，乐岁亦有之，在方隅有盛衰，在四季有多寡。”其作用于天地就会“上溷空明清静之气，下败水土污浊之气”，与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有着本质的差别。“盖因来而不知，着而不觉，人惟向风寒暑湿燥火所见之气求之”。《条辨》还强调《温疫论》的观点，认为杂气犯人，“各随其气而发为诸病”，某种杂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不关人之强弱，血气之盛衰。又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是知气之所来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并断言某种药物可治某种杂气。“毒雾之来也无端，烟瘴之生也无时，湿热熏蒸之恶秽无穷无数，兼以饿殍在野，骸骨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连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虽童男室女，以无漏之体，富贵丰亨，以悠闲之志，且不能不共相残染，而辛苦之人可知矣。”既论述了杂气产生的根源，又阐发了温病发生的机制及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杂气与六淫截然不同，它的特点一是种“类无穷”、“其气各异”，为一切疫病毒邪之总称，因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二是杂气皆毒，对人体的危害远比六淫严重；三是杂气存在于天地之间“无形无声”，人体不易觉察，不似六淫之寒热温凉，人易感觉；四是各种杂气均有地域性、传染性，且无明显季节性；五是传染性的大小取决于杂气的强弱。《条辨》云：“伤寒不传染于人，温病多传染于人。”在吴又可杂气学说的启发下，杨氏进一步对瘟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作了深入探讨。

2. 辨证候 伤寒与温病病源、病机既异，故临床表现亦有差别，特别是初起证候，大相径庭。

(1) 症状 《论候辨》说：“自觉肌肉粟起，即而四肢拘急，头痛、发热、畏寒、恶风、脉缓有汗为中风，脉紧、无汗为伤寒……。温病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三焦……伤寒之邪自外传内，温病之邪由内达外，伤寒多表证，初病发热头痛，末即口燥咽干；温病皆里证，一发即口燥咽干。”又：“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温病伏邪在内，内溢于

经。”瘟疫亦可见到畏寒、发热、头痛、身痛等表证，杨氏阐述其产生的机制：畏寒是因“阳盛格阴所致”；头痛乃由“热郁于内，上攻头面而发”；“杂气佛郁三焦”由内发于外而发热；“热郁表里阻隔，阴阳不通”则为身痛、骨节疼痛等。他依据有诸内必形于诸外的理论，揭示了体表症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体表证候的出现并非邪气直接到达肌表，损伤肌表所致，而是里证发越于外的表现。至于伤寒表邪化热入里，则证候与温病多有雷同者，故杨氏曰：“温病与伤寒表实不同，里证无大异。”

(2) 脉象 杨氏指出：“凡温病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于左手，总有佛热郁滞，脉结于中故也。若左手脉盛，或浮而紧，自是感冒风寒之病，非温病也。”“凡伤寒自外之内，从气分入，始病发热畏寒，一二日不作烦渴，脉多浮紧，不传三阴，脉不见沉；温病由内达外，从血分出，始病不畏寒，而发热，一热即口燥咽干而渴，脉多洪滑，甚则沉伏，此发表清里之所以异也。”首先，温病发病为天地杂气自口鼻直中中焦，充斥奔迫三焦，为邪气直中，故气口脉盛；第二，温邪病机为佛热郁滞停留肌肉之分，因病位不属于表，故温病脉象为不甚浮沉，但中取洪、长、滑、数；第三，因阴阳相抟，故寸口脉阴阳俱紧。而伤寒则因感冒风寒，为天地之常气，故其传变遵循由表入里、由阳入阴顺序，受邪于气分则病位尚浅，故脉象表现为浮紧或浮缓之不同。

其辨别的关键，在于伤寒初起多见表证表脉，热象不著；温病初起即现里热灼盛之象，多无表证，纵有表证，多是里热浮越于外所致。

3. 辨治法

(1) 异机异治 杨氏认为伤寒与温病初起治法即有天渊之别。伤寒多感太阳，温病多起于阳明，“在伤寒，风寒外入，但有一毫表证，自当发汗解肌，消散而愈，其用药不过麻黄、桂枝、葛根、柴胡之类；在温病，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热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正发汗之理。故伤寒以发表为先，温病以清里为主，此一着最为紧要关隘。”又说：“伤寒感冒风寒之气，自外而传于内，又在冬月，非辛温之药何以开腠理而逐寒邪，此麻黄、桂枝、大青龙之所以可用也；若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郁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畏寒而做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又多发